

跟着总书记识文脉

世界最早陶器,是中国人的“发明”

本报记者 严粒粒

发明文字的人,肯定是个文盲;发明钻木取火技术的人,肯定也没有学过物理。但是,为了生存与传承,他们都必须去创新,去发现,去向大自然“借点子”。

也许,人类的骨子里,天然就有创新的DNA。例如,从彪炳人类文明史的“四大发明”再往前推,早在两万年前,古老的中国人就开始了“创造发明”——

6月2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调研。

“中国是世界上陶器起源最早的国家吗?”总书记向讲解员询问。

“是的。”

“不是‘最早之一’,就是‘最早的’?”总书记又问。

“是的,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现的早期陶器,基本都是从中国起源之后传播过去的。”

陶器,是人类第一次通过改变自然物的质,按照自己意志制造出的一件全新物品。它体现了人类对水、土、火的认识和把握,在人类智力发展和文化进步历史中,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按照现有的考古依据,中国是世界上陶器起源最早的国家,时间在19000年前到20000年前。(记者注:捷克发现过29000年前到25000年前烧制的实心陶塑,与陶器代表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意义不可比较,下文中所称“陶器”代指陶容器。)这是国际考古界公认的断定。”近日,面对记者的采访,参与江西仙人洞遗址考古发掘的万年县博物馆馆长王团华说。



2009年仙人洞中美团队联合陶器考古合影。万年县博物馆供图



陈列在国家博物馆的仙人洞陶罐。

储存食物的器物。所以西方社会有“前陶新石器时期”说法,意思是新石器来了,陶器还没出现。

直到2012年“中国仙人洞遗址万年陶器”相关文章的发表,“常识”在可靠的物证下被颠覆——新石器时代还没到来,陶器就在中国出现了。

有人也许会好奇,一项考古论文为什么不发在《世界考古学》之类的考古期刊,而是在《科学》这本科技期刊上?

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陶器年代的得出,是碳-14测年法在起着决定性作用。而碳-14测年法建立的基础是核物理学,他的发明人在1960年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时间的证据

作为碳的有机物之一,小小的碳-14原子,是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一个能够计算时间的“时钟”。

科学家发现,环境中,碳-14与“兄弟”碳-12的比例是固定的。动物和植物在活着的时候,会通过呼吸、进食等方式摄入碳-14和碳-12,最终在体内形成与外界比例一致的碳-12与碳-14。而当它们死亡,碳-14的摄入就会停止,体内碳-14的含量会不断减少,而碳-12的含量却不会有多大变化。

碳-14的半衰期为5730年,即经过5730年以后,碳-14的量只剩下

半。因此,只要拿着一块骨头或者种子,测一测其中碳-14和碳-12的比例,便可以推断出年代。

曾经,意大利都灵大教堂有一件从16世纪开始收藏的“宝贝”——一块据说是耶稣受难后门徒约瑟用于裹尸的麻布。这就意味着,这应该是公元一世纪左右的文物。但是直到上世纪80年代,科学家们用碳-14测年法告诉世界,这块布是中世纪织出的一件赝品。这算是考古史上的趣闻。

不过,也许又有人会好奇:陶器又不是动物和植物,要如何使用碳-14测年法来鉴定它呢?

这也是为什么,论文其实在2000年前后就写定稿,却在2012年才被发表的原因。

让我们回到陶片被挖出来的那一刻。

初次的亮相

江西仙人洞遗址的发掘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

当时,江西省文物局的工作人员收到一封群众来信,信中提到在万年县陈营区大源乡有个奇异的大石洞,洞口附近散落着一些骨骼碎片。这封信引起了文物局工作人员的关注。

此后,国内外考古人员对遗址有过多次大规模发掘,出土了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比如石器、骨器、蚌器、动物骨头、陶片和植硅体等。

在吴小红进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工作后不久,就在学术前辈们的影响下对中国早期陶器的年代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江西仙人洞遗址出土的陶片的年代问题给予了关注。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专家也对仙人洞出土的

陶器本身进行过碳-14测年,测定陶片距今18000年左右。不过,国内学界对这次结果抱有疑惑。”王团华认为,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来,18000年前已经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颠覆了学界对“新石器时代才有陶器”的认知;二来,过去学界一直认为先有农业才有陶器,而18000年前还没有所谓农业可言。

后来,吴小红从同事那边得到了可以进行年代测定的仙人洞遗址出土的动物骨头标本。由于出土的陶片太碎小(大约只有指甲盖大小)、时代太久远等原因,无法提取里面残留的有机物进行直接的年代测定,她便通过与测定陶片同层位出土的动植物等标本来进行年代测定,以推断陶器的年代问题,得到了一系列数据。

吴小红不确定这种“推断”是否奏效。一次国际会议,她把研究成果拿出来讨论,想听听同行的看法。

那次,同行没有接纳。

一段时间的学界不认可,虽有遗憾,但在考古专家们看来,却也在情理之中。

考古必须是严谨的。它为解读历史提供证据。解读可以出错,错了可以改,但是证据不能。

再一次确认

在后来的采访中,吴小红解释:当时,考古结果不接纳的原因,关键在于没办法证明采集的碳-14标本跟陶器是同时的,有等时性的。

换言之,学界并不认为,洞穴中同一地层的陶片和动物骨头、植物遗存,必然就属于同一时代。

吴小红接着解释:人类进入洞穴的时间不一定是连续的,可能是冬天来了,夏天就走了,也可能过了几年才来

洞里一趟。每次回来,都需要挖挖土、整整地。这种底层扰乱意味着同一土层里很可能混杂着不同时期的东西。还有水流也可能将洞外不同时期的东西带入洞,连老鼠打洞都可能把上面地层的陶片带入下面的地层当中。而早年发掘出的用于测年的文物,又因为种种原因,导致了标签混乱,更为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难题。

几年后,吴小红参加了由北京大学、湖南省考古研究所与哈佛大学组成的中美联合研究项目,深受启发。她意识到研究要解决中国早期陶器的年代问题,需要从发掘现场到实验过程的每一步都准确、可靠。

王团华记得,2009年,吴小红和同事们重回仙人洞遗址现场,在不同地层采集土壤、动物骨骼等样本,也重回实验室把它们用更科学、严谨的方式进行处理分析。样本被送到了美国 and 北京两地的不同实验室,同步检测分析,以厘清陶器与样本的等时关系。

那次,参与联合研究的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欧弗·巴尔-约瑟夫教授、波士顿大学考古学系的戈德伯格教授等人,都是考古界的国际顶尖学者。

最后,当2012年论文发表,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那么,在两万年前的狩猎时代,仙人洞里发现的陶器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王团华说,欧弗·巴尔-约瑟夫教授认为,早期陶器应该是用来蒸煮食物的,“因为出土的陶器底部有烟痕,有火烧的痕迹。”专家推测,当时的狩猎生活大概难以保证人类获得足够的食物。人们就用陶罐煮骨头汤,用来弥补食物及营养的不足。所以,陶器的产生和食物的短缺有密切关系。不过,一切都还要更可靠的证据。”

历史是一个不断延伸的过程,“现在”正不断地成为历史,“过去”则不断地被确认。

而我们就是在这一系列的不断“确认”的过程中,认识到整个人类何其渺小又伟大,我们的文脉何其悠长又深厚。

延伸阅读

《中国陶瓷史》(叶喆民著)为古陶瓷学专著。

该书脉络清晰,内容丰富、详实,图文并茂,是一部阐述中国历代陶瓷工艺发展历程,同时也反映了各朝代经济、政治、贸易往来变迁,体现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历程的陶瓷书籍。



《浙江学术编年》(许宏著)首次以编年体逐年著录浙江学术史的发展演变历程与成果,上溯远古时代,下迄1911年,分为先秦至唐五代、宋代、元明、清代四卷,每卷再分上下册,共计四卷八册,550多万字。

在成果著录上,包括浙江学者在浙江的学术活动与成果、非浙江学者在浙江的学术活动与成果、浙江学者在浙江以外区域的学术活动与成果。全书除了充分吸纳既有学术编年史成果之外,还充分重视地方志及相关文献的整合收集。

三是体例创新之价值。《浙江学术编年》借鉴《史记》与《资治通鉴》不同板块组合的成功经验,充分吸取当今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在著述体例上高度集现有编年体著作的优点而加以融会贯通,旨在使以时间为流程的学术编年走向丰富性和立体化。例如,其除了撰写长达5万多字的“前言”之外,又在每卷以及每个朝代之前冠以“卷序”与“小序”,彼此相互配合、相互呼应,旨在起到提纲挈领、贯通学脉的作用。

四是谱系建构之价值。《浙江学术编年》努力超越简单的以相关史实的逐年排列,而是旨在通过史证与史识的对话交融而还原学术史的历史场景,建构学术史的思想谱系,进而探索学术史的发展规律。为此,《浙江学术编年》尤其注重“三维度论”与“三要素论”的引领与交融。所谓“三维度论”,是指“时间—空间”“本土—他者”“近承—远绍”三个维度的有机交融。所谓“三要素论”,是指重在把握和贯通“学统—学缘—学脉”三个关键环节,三者分别具有宏观(学统)—显性(学缘)—隐性(学脉)的特点与功能。比如《浙江学术编年》所总结的浙江学术精神的“六大精神”,彼此既在历时性的维度上体现了继承性与变异性的统一,又在共时性的维度上体现了独特性与共时性的统一。彼此的最大公约数是“经世致用,与时俱进”。这是浙江文化精神历经风雨沧桑的不断发展,也是推动浙江文化创新发展生生不息的永续动力。学术思想谱系建构的“三维度论”“三要素论”的融会贯通和综合集成,同时兼具理论探索以及方法论意义。

《浙江学术编年》是一项基于浙江而又超越浙江的大型基础研究工程,不仅可以为浙江区域学术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起点和重要参照,而且有助于从浙江区域的维度为“重写中国学术史”贡献新的探索与成果,有助于为当代文化精神的探索提供丰厚的学术思想资源与成果,也有助于拓展与其他区域板块乃至海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由于工程浩大,时间紧迫,《浙江学术编年》下限截止于1911年,但根据上述有关“三大时段”“四大高峰”与“六大精神”的总结提炼,还可将“浙江学术编年”延伸至现代,期望有新著《浙江现代学术编年》的问世。

(作者系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何以中国》(许宏著)讲述了始于公元前2000年,中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通过陶寺的兴衰、嵩山地区文化的星罗棋布、新砦遗址的崛起等,最后辐辏到二里头遗址——中国最早广域王权国家的横空出世上来,进而解构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诞生。

《何以中国》(许宏著)讲述了始于公元前2000年,中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通过陶寺的兴衰、嵩山地区文化的星罗棋布、新砦遗址的崛起等,最后辐辏到二里头遗址——中国最早广域王权国家的横空出世上来,进而解构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诞生。



从一个废品站淘回的国宝说起——从“宅兹中国”到“最早的中国”

见习记者 林晓晖

这是一件珍贵文物。“何尊”就这样以30元的价格买进了博物馆。

在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背后,我们看到了文物“抢救”工作的惊险不易。

“考古是一门研究‘垃圾’的学科。”考古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说,考古学一般被认为是通过物质遗存研究逝去的人类社会的学科,物质遗存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人的“垃圾”。

时光蒙尘,许多珍贵的宝贝,最初都是以毫不起眼的旧物存在,文物工作者、考古学者在废品站“淘宝”的故事并不稀奇。元代的青铜欢喜佛、商代的文物牺首兽面纹圆尊,都是在废品站被发现的。出于本能、出于专业知识的敏感,还有日复一日蹲守的执着,许多国宝得以涅槃重生。

辗转进入博物馆之后的何尊,给世人带来了一个更大的惊喜。1975年,饕餮铜尊因其造型图案精美被选送至国家文物局作为全国新出土文物精品出国展出,经过清理除锈,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在何尊的内底,发现了一篇122字的铭文。

最早的“中国”

短短122个字的铭文比较艰涩,经由专家翻译,它记载了周王室的一位重臣,放言要“居住在天下的中央”的故事。

周成王五年四月,成王对贵族子弟进行训诰,号召这些年轻的贵族子弟要向父辈学习。一位叫“何”的周王室重

臣,在刚建成的洛邑(周朝金文称“成周”、“王城”)受到新居那里的王的训诰和赏赐。“何”用得着的赏赐,铸成这件铜尊,记载这一重大殊荣。

其中有一句“余其宅兹中国”,意思是“我要居住在天下的中央”。就是这吉光片羽,牵引出了“中国”这一亘古悠长的话题。

实际上,这里的“中国”其实并不是指代现在我们生活的国家,它接近地理概念,仅仅指代的是当时伊河、洛河流域的中原地区。

武王灭商之后,就曾经对天发誓:我要在天下中心的地方建都居住,并在那里治理安定民众。这之后,就有了成王在洛阳建立都城。他们认为,伊河这一带是夏商两个王朝的都地,四方小国经常来这里进贡,自然就是天下的中心地带。

仔细端详“何尊”上的“中国”二字,还有许多奇妙的发现。

“中”字就像一面飘扬的旗帜,“国”的原始字形在当时是“或”字,看上去就像一位执干戈以守城邑。

有学者认为:“中”的本意指旗杆,部落首领可以用它召集众人、发号施令;《说文解字》中解释,“或,邦也”,意思是“或”的本意就是国家;“○”也就是“口”,表示人们居住的地方,上下两横就是为了保卫国家或者城邦而挖掘的壕沟,右边的“戈”则表示只有拿起武器才能保护城邦。

何尊最大的价值便是铭文中“中国”二字作为词组最早出现。尽管它与现在的“中国”不是同一概念,但这种提

法与国名“中国”的出现之间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关联,在古老的器物上,我们得以一窥文字的源流,看到了最早的“中国”的轮廓。

唤醒文化记忆

何以中国?中国从何而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这样的问题。

“说起中国人的情感一向是比较复杂的。我是谁,我们是怎么来的、我们站在什么位置、下一步该怎么走……这是每个中国人都正在思考的问题。”许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个人的专攻就是——“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

在许宏看来,考古学从创立之初就不是所谓的“象牙塔”的学问,而是和每个中国人都密切相关,考古学就是一门要解答大家都关心的根本问题的大学科。

“我们是谁?我们是如何形成的?”考古学者们一直试图解决这个困惑。

20世纪初,中国“一片甲骨惊天下”。因为甲骨文的发现,商王朝从传说成为信史。国际上普遍将此认作中华文明的起点,距今只有3300年。中华儿女引以为傲的“5000年文明”的说法仍然受到质疑。

浙江良渚古城的现世,打破了这一僵局。这座出现在5000多年前的古城揭示了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工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

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被叫做“中国”?

有学者统计,“中国”一词,在先秦典籍里出现108处。从先秦的“中央区域”“城中”“邦国”“都城”之义,汉唐的“中土”“中原”之称,再到近代演为与世界诸邦并列的民族国家之名,含义在不断流变。

“我们从何而来”这是人类本能的好奇,考古的魅力也正在于此。溯源而上,在泱泱历史长河里找寻这星星点点的文明印记。

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中国国家版本馆,展厅中陈列了一件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它的内底刻有铭文“宅兹中国”。这便是“中国”之称最早的出处。

废品站“淘”国宝

这座印证“中国”起源的国宝级文物有一段曲折的考古往事。

1963年6月,宝鸡陈仓区贾村镇贾村村陈堆因家里老屋住不下,租了隔壁陈堆的两间房子住,院子后面是个土屋。8月的一天,下过雨后,陈堆发现土屋上好像有亮光,结果就刨出了个铜器。当时,谁也没把这个看起来造型奇特的物件当回事儿,村民们把它卖到了废品收购站。

文物眼看就要和废品一起熔毁,一位经常在废品回收站“淘宝”的宝鸡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发现了它。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院长陈亮介绍,当时的馆长吴增昆听到消息后,随即让保管部主任王永光前去查看,初步判断